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Sustainable Urban Design:
Local Strate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flict

冲突视野下的 可持续城市设计 本土策略

莫霞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Sustainable Urban Design:
Local Strate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flict

冲突视野下的
可持续城市设计
本土策略

莫霞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聚焦“可持续城市设计”，旨在以一种“冲突”楔入的视角和本土建构的线索贯穿，考察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面临的主要冲突领域，并借助与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的实证研究，探索“冲突视野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理论体系。全书紧紧围绕上海城市发展要求与诉求，关注城市发展中各要素的平衡把控，以及城市社会要素对于城市设计的需求和影响，探寻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实践对策及策略建议，并探讨制度方式上的配合可能与变革顺境。

本书是对当前我国城乡发展问题的思考和应对探索，也恰恰应和了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紧要任务和迫切需求。同时，借助一种多学科综合的、“冲突”研究与分析的思路和阐述，注重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相信对规划设计行业的学者、专业人员和学生有所启发，为政府和行业提供专业视野和决策支持，为关注自身生活与城市发展的人们提供认识的桥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突视野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 / 莫霞著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478-4200-3

I. ①冲… II. ①莫… III. ①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0484 号

冲突视野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

莫霞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71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www.sstp.cn）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470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8-4200-3/TU · 269

定价：15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一

可持续城市设计相关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构成一个成熟的体系和完整的系统，更缺乏联结现实国情和社会情境的策略研究——中国有着自身特殊的城市发展情境及历史文化原因，地域的广博、每个城市独特客观的自然环境特征等，都促使城市设计必须结合本土现实来探讨更具实践性和可行性的具体策略与方法。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建构正面临日趋复杂而多元的冲突，城市空间的发展涉及政府、商业利益群体、民众等多元利益主体，既受到人与自然、价值冲突、贫穷与消费、效率与公平等可持续发展建构的根源性冲突的影响，也置身于城市设计建构总括式的冲突境遇之中。

由此，本书开拓研究视域、突破专业束缚，借助多学科综合的分析建构，同时侧重本土经验和模式的探索，拓展城市设计的思维模式与实践体系，探索中国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的现实路径。

本书作者莫霞从业近20年，致力于城市设计、城市更新等专业领域，一直具有专注的热情、持续的投入，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2013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建筑设计院工作，始终奋斗在第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上海的建设发展贡献了自身的一份力量。紧紧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研究领域，莫霞参与了大量的规划实践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与结合，更加深入地思考在不同冲突要素下，我们必须面对和坚持的价值导向与发展期许。

本书可以说是其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综合成果的总结；适用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城乡规划学相关专业教师，与城市研究有关的社会人士，对城市规划、社会发展有兴趣的读者；可作为城市设计相关专业课程阅读材料，具有科技学术上的良好作用与意义。我郑重推荐本书，并期待后续在实践研究与理论提炼上的进一步展现。

曹嘉明



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

2018年12月20日

序二

本书是莫霞博士十多年来研究和实践相结合的心血之作。浏览全书，感慨良多，有几个词跃然心上：冲突、本土、知与行。

把“冲突”作为认识可持续城市设计的视角，也许是当年作者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创新。从2006年到2013年，作者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师从王伟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城市设计。其论文能结合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把解决冲突（如公与私的冲突）作为可持续城市设计的策略问题来研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经过多年讨论，慢慢形成了共识，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城市设计的策略，则必须因地制宜，应对城市具体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建成环境。作者生于齐鲁大地，长在浦江之畔，“本土”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对城市生活深刻的理解。

作者从1996年进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学习，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再攻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其专业学习的经历有十几年。可以想象，她对于专业的认识是在不断的递进中积累的。城市规划学科在2011年升格为“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之后，更加体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和多学科融贯交叉的特征。近年来，经济地理、社会学、公共管理学、资源环境学等相关学科的参与度有了显著的提升。一个“知”字，多少光阴！

书中反映的“行”，是与六年来作者在华建集团规划建筑设计院工作的经历紧密相连的。其中有一个施展才华的重要契机，就是上海的静安、闸北二区合并为新静安区，苏州河两岸进行城市设计整合、新静安区进行总体城市设计的研究。在这一系列的实践工作中，作者以前的研究积累有了用武之地。调研、协调、作图、汇报，她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忘我工作，把对专业的热爱，表现为执着的投入和持续的热情。自然，她也收获了成果和荣誉。

在我的眼中，这本书正是一个年轻的博士成长为一位成熟的主持规划师的见证！
知不易，行更远。

李振宇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2018年12月20日

序三

正如作者强调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是21世纪城市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压力下的必然产物，指明了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拓展的未来方向。本书以一种创新的、结合社会学的视角，来认识城市设计、思考可持续城市设计的关键问题，对当下城市设计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多学科融合的城乡发展应对，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与启发。

近些年，全国不少城市在积极开展城市设计的相关工作。尤其，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着力创新城市管理服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其中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方面，要求提高城市设计水平，明确城市设计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鼓励开展城市设计工作，同时要抓紧制定城市设计管理法规，完善相关技术导则。支持高等学校开设城市设计相关专业，建立和培育城市设计队伍。2016年9月，在全国城乡规划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分析了城乡规划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研究推进城乡规划改革的总体思路，部署城乡规划改革重点任务。会议明确要建立城市设计制度。

本书的出版正是对当前城市发展问题的思考和应对探索，也恰恰应和了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紧要任务和迫切需求。同时，借助一种多学科综合的、“冲突”研究与分析的思路与阐述，并注重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人群，相信可以对规划设计行业的学者、专业人员和学生有所启发，也会使每一个关注城市发展的人对相应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

最后，衷心祝贺本书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支持并顺利付梓发行。

叶贵勋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2018年12月20日

挑战与变革：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21 世纪城市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1900 年，城市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 10%；1950 年，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30%；2008 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世界人口的 50%；2018 年年初，世界人口突破 74 亿，而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也增加至 55%。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18 年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指出，到 2050 年全球城市人口总量预计将增加 25 亿，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将增加到 68%。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造成城市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建设活动无限蔓延，进而导致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毁损、资源和能源短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在今天，城市发展进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多项科学证据表明，因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尤其是煤、石油和天然气燃料在建筑、运输和生产等方面的大量使用，导致 CO₂ 不断增多，使得全球变暖日益明显，而全球变暖的危害不仅在于造成越来越多的风暴、洪水、热浪威胁、飓风、冰川融化，更在于其危害的不可逆转性。尤其在城市地域，虽然其面积仅占陆地面积的 2%，但由于大量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集聚，城市人口消耗了生活用水总量的 60%，能源总消耗量的 70%，占垃圾产生总量的 75%，所排放的 CO₂ 占总排放量的 78%，城市热岛效应更为突出，空气污染进一步加剧。许多城市正在以严峻的资源危机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人口的超负荷活动，城市环境质量大大降低，城市防灾也形势严峻。这迫使政府、理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才能使 21 世纪成为中国从不断向环境透支与索取、能源与资源高消耗、利用模式粗放，转向合理利用各种资源、集约利用能源，进而促进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必须全社会配合来共同解决。而城市是“权力与集体文化的最高聚集点”（刘易斯·芒福德，1983），也是人类聚居和能量消耗、污染和废弃物排放的主要场所，其建设和发展也就成了人类消耗能源和资源、改变环境和生态足迹的最重要的方式。人们认识到，城市可能是主要问题之源，但也可能是解决世界上某些最复杂、最紧迫问题的关键，而城市完善的体制也使之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有效起点。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城市的模式进行研究。城市设计是建构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并一直在城市模式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21 世纪的城市设计，应当对城市的发展模式和设计模式都有所作为，并需要在理念上和技术上进行深入探讨并加以支持。

转型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建构的冲突境遇

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及民主化的相互作用在今天交织在一起，加快了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转变，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联系空前紧密，城市的组织模式和发展模式也因之产生了巨大转变，资本、市场、稀缺资源的竞争日益加剧，并不断引发社会问题与生存危机。可持续建构的命题应运而生，并日益发挥重要且核心的现实作用。人们试图在危机中不断探索城市发展的创新模式，并积极构建促进生存与平衡的城市发展的适宜路径。

可持续发展已被我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低碳转型等先进理念相继提出，以“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城”等形式为代表的可持续实践探索广泛推展，为具体化地落实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尽管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在可持续性方面取得显著进

步，特别在满足城市居民基本需求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在某些方面却落后于平均水平。直到今天，具有典型意义的“可持续城市”的成功实践仍未出现，甚至还存在着这样的不利倾向：“可持续”被简化为单一的考量、削弱成陈词滥调，模棱两可或者被奢侈地、无目的地建构——当前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建构，既呈现出国家层面政治推进的强大示范性，也存在城乡地域层面发展的巨大差异性；既有大范围推展的规模优势，也存在迎合热潮下的盲目跟风；既表现出新时期发展机遇激发的创新性，也蕴含浓厚的实验性与探索性；既体现出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想建构，也由于实践力不足而局限重重。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面临着与其他民族、国家同样的风险与危机的同时，由于本身的独特性，还有许多内生性的问题，使得国家内部又有着独特的风险与问题：一方面，存在各种阶层与群体的不断形成并彼此互动纠葛，衍生出一系列社会冲突问题，如旧城拆迁和居民的补偿与安置已事关城市和谐稳定与发展；利益格局也在不断进行调整，新型社会控制机制因在建立和完善之中而效力不强，利益团体的复杂则直接变现为价值认同的差异，并激化矛盾的发生发展。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短期内突发式的城市扩张和加速城市化，使其面临巨大环境压力且无处外推，造成狭小范围内的发展策略失效。冲突的发生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频繁和激烈，朝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危机消弭机制也从未如此急需和必要。

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变革诉求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解决经济、政治、社会 and 物质形式问题的手段”（戈斯林等，1984）、“一种社会空间过程”（阿里·马达尼普，1996）、“一种动态的艺术和一种程序”（蕾切尔·库珀等，2009），一直在城市模式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经过多年的发展，城市设计已经具备了完善的体系，有自身的目标、设计方法、评价标准和实施手段。这一体系发展得如此成熟，以至于城市设计的专家可以用它来解决已有的城市问题或者营造新的城市。

然而，当今城市生活与社会情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环境、资源问题，促使思维模式与实践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城市空间已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那样被认为是一种经济与社会进程的“容器”，而是日益增多地被置于特定的地域特征、社会文化及政治背景来考察，作为一种重要的和可辨识的当地的生活与生产要素、一种整合和平衡的要素及一定地域内人们生活中社会关系的结果。相应地，城市设计越来越多地涵盖自然生态、社会意涵及应用层面，并将与城市空间相关的观念、社会、文化、政治、行为、结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综合建构，以寻求城市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困境的突破。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美化和推销自己城市的重要手段（张庭伟，2001），城市设计已在我国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长久以来盲目追求“大规模”“高速度”“城市美化”，导致“建设性破坏”突出、再格式化泛滥，空间极化生产现象也日趋明显，我国已有的城市规模和空间形态受到巨大冲击，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很多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仍体现为一种空洞的口号和枯燥的教条，对变化无所适从，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显得束手无策。

正是在上述发展趋向与现实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当前中国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亟须将重点拓展至关涉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和环境保护的多元目标，融合中国自身特殊的城市发展情境和历史文化原因，结合本土现实问题来探讨更具实践性和可行性的城市设计策略可能。本书试图借助多学科综合的分析建构，面向当前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的核心冲突问题，同时侧重本土经验和模式的探索，聚焦“可持续城市设计”，以一种“冲突”楔入的视角和本土建构的线索贯穿，考察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面临的主要冲突领域，并借助与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的实证研究，探索“冲突视野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机制，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于一体。

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挑战与变革：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	1
理论溯源	3
城市设计的趋势面向	13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关联考察	19
“冲突”的理论架构与借鉴视角	31

第二部分 分析范式：从“元话语”到“主情境”	39
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城市发展的冲突境遇	41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建构的现实及问题	50
“元话语”：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	56
“主情境”：冲突求解机制下的研究方式	62
上海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的五个冲突领域	67
社会建构思路下的策略分析版图	83
冲突的应对：城市设计建构的实践分析路径	90

第三部分 空间建构：七个城市设计案例 107

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楼宇经济”的时空演变	109
上海新天地：“华丽舞台”的得失批判	118
多伦路社区：照进现实的“保护更新”	124
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环境改善与功能转型	131
东滩生态城：设计理想与实践困境	140
虹桥商务区：“顶层设计”的冲突设问	147
上海世博会与“后世博”图景：全球语境下的本土谋划	155

第四部分 社会行动：四个社会事件主题 165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区开发	167
旧区改造与文化复兴	180
宜居环境与生态建设	193
促进社会和谐的本土治理	208

第五部分 冲突视野下的建构理想与本土策略 235

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建构理想	237
“空间建构”与“社会行动”的本土策略耦合	239
上海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的冲突审视	251
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体系的主要内容	254
研究创新的价值与后续计划	262
参考文献	265
致谢	271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

借鉴和利用已有的理论，探寻研究的多学科渊源所在，考察城市设计、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冲突”相关的理论架构与关联性内容，并明晰这些理论研究内容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策略研究整体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共同成为本书基本的和开放性视野的理论框架构成。

海洋大学景色。
2017.8.12 秦莫非



理论溯源

策略研究的宏观背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模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 2000 年曾在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指出：21 世纪初期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事件，除了高科技以外，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近几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图 1.1），进入快速增长期，并伴随着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近 10 年来年均提高约 1.26%，2017 年城市化率已达 58.52%，中国 2030 年城市化率预测可达 70%。2010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生质的变化，进入以城镇人口为主的阶段，跨入了城市社会的门槛，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断改变，并引起全球层面人口的城乡布局转变。推进城市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今天解决多重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手段。然而，“城市化既可能是没有什么可以予以超越的未来的光明前景，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的凶恶兆头，因为未来怎样就取决于我们此刻的所作所为”（沃利·恩道）。工业革命以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也使得城市人口持续增长和高度集中，诱发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对生态

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并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带来了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城市拥挤、住房紧张等问题，同时不断引发社会问题与生存危机。这迫使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城市发展模式，并积极探索生存与平衡的适宜模式。

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过去人们积极应对城市化问题的有益模式及探索。虽然我们不能单纯依靠某一经典理论来达成提高效率、改良社会及实现美好生活的整合性目标，过于倚重模式也往往容易陷入“物质空间决定论”的巢窠，但无论是田园城市、城市美化运动，还是机械理性与有机疏散的思想及新城建设，事实都反映出了人们积极应对城市化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对今天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全球化浪潮洗礼下的城市发展途径与方法，具有重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城市条件及其驱动力在当代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区域发展和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城市化发展的复杂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已构成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体；城市也已成为促进全球化、社会与经济增长、其后变化及环境保护等各因素之间互动的“节点”（雅克，2010），并成为增长、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进程的核心。这对于处于快速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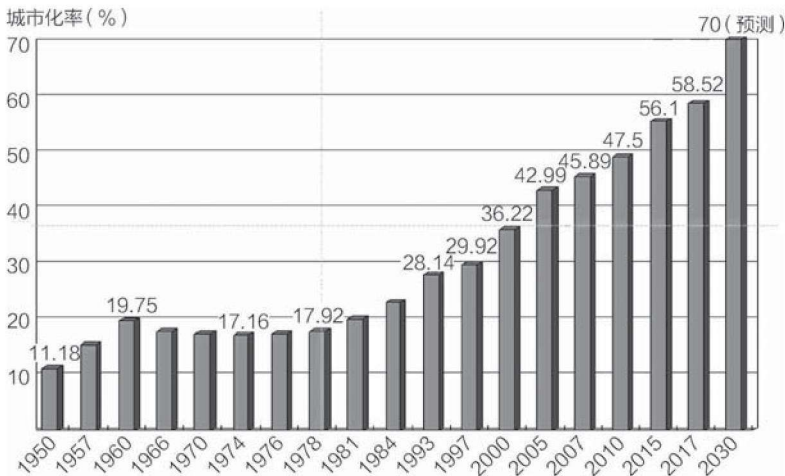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城市化之路（1950—2030）

的一种“结果”，更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手段，且已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原因”。其中，既有城市空间“量”的增加，如城市建成区扩大、增加新的城镇等；也有“质”的提高，如旧区的改造与重组。城市化作为一种生产手段已引起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功能转变，行之有效的相关行动变得更加迫切，而留给人们的行动期限越来越短。

策略研究的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析

“可持续发展”是关乎人类未来生存的必然选择。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其实质是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追求人与人之间公平发展的权利，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满足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需要。其核心是发展，其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自此，可持续发展不仅成为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焦点，也成为全球共识和指导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原则，构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日益扩展和深入。

要理解和探究可持续发展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发展理论”和“生态伦理学”构成了两个重要来源。其中，发展理论的最早范本是西方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模式，其基本精神是从西方的认知范式出发，核心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强调用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手段推进工业化、都市化、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化，其内涵也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诞生得到新的提升和拓展，从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政治、环境等综合的领域（表 1.1）。

我国也相应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具体实施可持续战略提供了科学的观念。生态伦理思想经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的酝酿和 80 年代、90 年代的发展，其实质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以自然的价值论和权利论为核心（表 1.2）。由此可以发现，可持续思想的历史渊源实际体现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维度的整合发展和系统生态。“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远远超过了发展与生态伦理的加和，需要从空间上横向协调和

表 1.1 国际社会发展思想的演变

发展阶段与特征	主要思想及发展状况
二战后至 20 世纪 60 年代 发展观的起点	1. 最初的目标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 2.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 3. 没有形成关于“发展观”的理论阐发
20 世纪 70 年代 发展观的转型	1. 侧重于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2. 提出内源发展思想 3. 提出在发展中要保护环境的思想
20 世纪 80 年代 新发展观的形成	1. 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 2. 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新发展观的广泛认同与拓展	1.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丰富与完善 2. 众多的国际会议、大量的国际合作 3. 可持续具体项目的实施

均衡、从时间上纵向延续和生长，是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上针对负效应的双重限定。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范畴在今天已从注重生态伦理、自然属性，深入扩展到以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为重点的广义领域，并涉及政治、科技、空间尺度等多维视角。这一时期与可持续发展意义相关的概念还有“绿色发展”“可持续生计”“协同进化发展”“生态发展”等。虽然至今为止，概念的表述众多，但简言之，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一种正向而有益的过程，是指一个系统全方位地趋向于结构合理、组织优化、运行顺畅的均衡、和谐的演化过程。通过上述对可持续发展思想演变与内涵的分析界定，考察当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与现实，则可以为可持续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内容的研究提供更为深层的思想指导与行动指引。

策略研究的渊源：城市设计理论的当代诠释

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设计的发展已从最初的“视觉艺术+物质形态”，到关注“行为、心理、社会、生态”，如今已经建立了要达到“优化城市综合环境质量”这一目标共识（图 1.2）。在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引入和酝酿、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迅速发展，城市设计作为一门当代

表 1.2 西方主要的生态伦理思想

年份	作者或机构	重要思想
1923 年	阿尔伯特·施韦泽	在《文明与伦理学：文明的哲学》（1923）一书中，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后来又提出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一切生物，要求对所有生物行善
1933 年	利奥波德	在《大地伦理学》中提出，为促进持续发展，必须考虑生态、社会和经济因素；考虑资源基础（既包括生物的，也包括非生物的），而出发点落于这一伦理取向：维护自然环境整体的伦理。首次提倡人们要和自然环境建立“伙伴关系模式”，并进一步揭示经济决定论是环境破坏的根源，主张不但要借助法律、经济的手段管理自然，而且要辅之以伦理的手段
1962 年	蕾切尔·卡逊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凸显了因过度使用化学肥料等而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使人类不堪重负而灾难重重。当时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已在美国一些城市出现，但关于“环境”的条款尚未出现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中。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引发
1968 年	以佩切伊为首的罗马俱乐部	致力于研究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出当代人类面临的几项关键任务：第一，人类文化上平衡的重建；第二，依据“新的生命伦理”，采取促进自然财富长期保存的政策，引导人们开发和利用环境；第三，坚决反对对技术进步的盲目追求；第四，通过“人的革命”提升人的素质，以控制和驾驭物质革命的狂奔
1972 年	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	在《只有一个地球》中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
1972 年	联合国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一届环境大会，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等文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环境角度关注全球问题，虽然没有解决多少实质性问题，但促进建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条件提到了联合国议事日程上，人们开始探索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模式
1972 年	罗马俱乐部	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给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自由乐观主义思潮带来极度震撼。其相关论证为之后的可持续及环境保护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1976 年	阿诺德·汤因比	在《人类与大地母亲》（1976）和《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976）两书中提出“拯救母亲说”，将“大地”形容为“人类的大地母亲”
1980 年	以“自组织理论”为核心的奥地利天文学家埃里克·詹奇	在《自组织的宇宙观》（1980）中研究强调了建立一种生态学类型的经济及技术发展方式
1983 年	彼德·罗素	在《地球脑的觉醒》一书中提出“地球觉醒观”，提出当今社会低程度的协同已导致了各种全球性危机，亟须借助变革来建立一种整体论、生态学的新世界观，促进社会高协同发展，加强对各种危机的应对
1986 年	霍尔姆期·罗尔斯顿	在《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1988）及《哲学走向原野》（1986）两部著作中，坚持了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思想，提出了自然价值论，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了一种独立于人们主观偏好的、客观的道德根据
1984 年	汉斯·萨克塞	在《生态哲学》（1984）一书中，技术被看作是人与自然的联结中介，提出技术发展对自然的作用后果直接与人们的未来相关。在使用技术时，人类应承认自然自身的价值，同时应当好“受托管理人”，保护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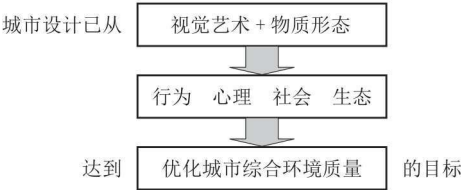


图 1.2 城市设计概念的演化趋势

新兴的交叉学科也早已发展起来，迅速充斥了纷繁多样的理论和大规模的建设实践，并贯穿于我国法定城市规划各个阶段的始终（表 1.3）。另外，在战略规划、城市整体风貌设计、历史名城（街区）保护规划、城市规划的管理等扩展的规划工作领域中，城市设计也致力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改造、新街区建设、居民生活改善等目标，侧重于城市的不同方面、不同要素，发挥着其独特作用。而不同阶段城市设计的研究对象、尺度、成果表达是不同的。

城市设计是在相关学科领域内发展起来的，因而与其他相关学科和实践领域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既得益于其他相关领域成果的融入，也对于其他领域的发展完善起到推动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

介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之间的一个设计环节，而是城市建设各个领域中所不可缺少的因素。由于自身的特点与复杂性，城市设计必须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来考察：一方面，城市设计强调的场所、精神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城市设计的参与者不仅有建筑师和规划师，还有市民、政府、业主等多种角色，各方利益之间的博弈，使得城市设计与政治经济学不可分割。

今天城市设计理论的发展早已突破了功能性理论范畴，形成了功能性理论、规范性理论和决策性理论这三个部分。此外，随着城市设计的理论、实践与政策相互促进的日益加强，城市设计法令规范在今天已成为确保城市设计实施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从美、日、英等国运作多年且相当成熟的城市设计制度来看，其法令的建立与落实都相当完备，涉及土地使用分区控制、城市设计指导纲要、建筑特殊控制、公共参与城市设计程序以及弹性的法令工具，如开发权转移、计划单元整体开发、特定专用区管制、社区设计指导和日本的建筑规定、地区开发制度等。

表 1.3 我国法定城市规划体系的内容

	内容		工作重点	研究对象	工作尺度
城市规划	城市设计贯穿于各阶段	城市与区域规划	研究生产力布局区域性基础设施，统筹城乡空间关系，协调城市间区域性结构关系	城市群及城市 县城范围	1:100 000~ 1:10 000
		城市总体规划	研究城市规划期内的人口、社会、空间发展目标及关系，统筹城市各类土地利用及基础设施规划，协调城市近期、远期发展与目标	城市（县）市 镇域范围	1:50 000~1:5 000
		城市分区规划	以城市相对独立的各功能区为对象，研究落实总体规划的各项要求，处理好人口、土地利用与各类基础设施的相关内容	城市功能片区	1:20 000~1:5 000
		控制性详细规划	对局部地区的建设进行的规划控制，确定土地利用、开发容量、建筑高度、覆盖率、绿化率、容积率、城市基础设施及建筑退让红线	建设项目	1:5 000~1:2 000
		修建性详细规划	对局部地区建设项目进行的规划安排，确定土地利用性质、项目规模、开发容量、建筑形态及相互关系、空间的群体关系、建筑高度、覆盖率、绿化率	建设项目	1:2 000~1:500

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建设体制下，尚没有确立城市设计制度并为之立法：2007年我国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并未提及城市设计；2005年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虽然提出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城市设计指导原则”，但对城市设计编制的内容、层次和深度均无明确规定。其法制化过程还需要加强以下工作：其一，专业规范，包括城市设计与建筑规划的准则、特殊目标的奖励内容规范；其二，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城市设计运作程序、组织规范及技术规定。

另外，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及不断进行调整，当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影响跨越了传统空间的制约，城市结构也趋于动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改革实验，非正式规划的广泛实践，正在我国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发生、发展，这也要求城市设计师在城市的定位与发展背景上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也正是由于前文“挑战与变革”中所述的一系列原因，我们在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对各方面详尽的全面研究和实证，达成一种整体的系统建构。作为一种预测性和实验性的应对，城市设计还将面对冲突与矛盾激发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我们还需要汲取国际上先进的发展理念、实践经验，甚至是有益的发展路径，如“城市创造”就是西方城市设计经验与日本实际相结合的城市设计理论。总的来看，国内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为可持续城市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而我国当前以东滩生态城等为代表的可持续实践也处于探索和发展的进程之中，这些都有利于城市设计的可持续讨论和议题的发展与深化。

策略研究的现实承载：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实践

生态城市建设中所运用的技术、方法和经验，一直是城市规划与设计解决环境问题、发展技术革新、拓展影响广度的重要方面，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城市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程度和实施效果。生态城市的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影响着并反映了城市对可持续性建构的追求，从而促使生态城市相关的

实践探索，成为可持续城市规划与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研究过程中，苏联城市生态学家亚尼斯基首次提出了“生态城市”这个理想城市模式，并在1987年进一步提出包含五个层次的完整的“生态城”设想；1996年城市生态组织则提出较为完整的生态城市建设十项原则，发展到涉及城市社会公平、法律、技术、经济、生活方式和公众生态意识等多方面更为丰富的原则体系；日本建设省从1992年开始组织专家学者探讨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概念及具体步骤，认为生态城市的建设至少包括节能、循环型城市系统，水环境与水循环，城市绿化这三方面内容。另外，以保罗·索莱里的生态城市为代表的生态理想城市构想也陆续出现，虽然其实现现阶段存在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但作为对城市在能源、空间、环境等方面的集约高效发展的创造性构想，对于当代城市以及城市设计自身发展而言，极富启发意义。

国内外一系列生态城市会议和学术讨论会（伯克利，1990；阿德莱德市，1992；塞内加尔，1996；莱比锡，1997；库里蒂巴，2000；深圳，2002）和人居环境生态建设主题大会（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1992；苏德霍恩，1995；伊斯坦布尔，1996）的召开，促进了生态城市理念的普及和传播，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建设实践。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在生态可持续的设计原则指导下，更为积极开展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的实践探索。印度的班加罗尔、巴西的库里蒂巴和桑托斯、德国的克罗伊茨贝格地区和海德堡市、美国的伯克利、瑞典的克里斯蒂安斯塔德、丹麦的哥本哈根、澳大利亚的怀阿拉和波特兰都市区等，无论是在建设规模还是深入程度上，大多依据城市的特点有所侧重地建设，均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和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为了应对能源危机和气候变暖所带来的问题，国际上又兴起低碳城市研究（表1.4）。随着2009年全球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参加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碳排放已经成为世界